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颠覆^与重构

DIANFU YU CHONGGOU

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
反乌托邦性

赵杨◎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颠覆与重构

——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乌托邦性

赵 杨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颠覆与重构: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乌托邦性/
赵杨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07-08475-0

I. 颠... II. 赵... III. 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俄罗斯 IV.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8311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韩冰

颠覆与重构

Dianfu Yu Chonggou

赵杨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475-0/I·1112
定 价 18.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反乌托邦性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天然 本性	(15)
第一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16)
第二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质	(24)
第二章 反乌托邦性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 体现	(46)
第一节 马卡宁的荒诞世界	(48)
第二节 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洛舍维奇的 小箱子》	(64)
第三节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小说中的“绝望 意识”	(69)
第四节 塔·托尔斯泰娅的童话世界	(82)
第五节 维·佩列文的自由王国	(93)
第六节 弗·索罗金的“人性之毁灭”	(105)

第三章 超越传统的反乌托邦性	(117)
第一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反乌托邦性”的文体 意识	(119)
第二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反乌托邦性”的 哲理化	(139)
第四章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乌托邦性与传统	(146)
结 语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78)
后 记	(185)

引 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涉及的“反乌托邦性”这一概念,是对“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延伸和拓展。众所周知,“乌托邦”一词最初是由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人文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提出的,系指虚构出来的一个岛国的名称。他在自己的名著《乌托邦》(1516年)一书中,结合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初期所存在的许多社会矛盾和弊病以及这一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血腥罪恶,并且通过对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岛国的细致描写,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卓越设想,在否定私有制的基础上,设计出财产公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方案,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追求刻画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图景。

尽管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他的未来社会理想,但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使他虽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未来社会的考量,仍缺乏科学的眼光。莫尔将“乌托邦”建立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上,期冀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水平上建立起美好的“公有”社会。因此,“乌托邦”不仅保留了奴隶劳动,而

且排斥商品经济,规划出统一格调的平均主义的生活模式。这样一种镜花水月式的“桃花源”,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托马斯·莫尔自己在《乌托邦》一书的结语中所说:“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此后,“乌托邦”便成了虚拟的、想象的、不可能实现事物的代名词。

到了20世纪,“乌托邦”已逐步上升为一个专门术语。在哲学领域,主要是由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年)拓宽了它的概念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17世纪以前,“乌托邦”的形容词形式不仅略带贬义(奇思怪想、痴人说梦、空想的、幻想的、理想化的),而且还用来指一种心理能力或精神倾向。布洛赫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发展了“乌托邦的”这个概念,他用“乌托邦的”来指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现象:趋向(尚未到来的)更好状态的意向。在布洛赫看来,这一精神现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地理乌托邦”、“医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等等。显然,布洛赫对“乌托邦”概念的使用更加宽泛和现实。他在《希望的原理》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中,从人的个体心理(精神分析学)、意识结构(现象学)、社会意识(对乌托邦精神的百科全书式的描绘)和社会存在、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这四个方面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了全面的刻画与探究。布洛赫认为,“尚未意识”、“尚未形成”,尽管它们充实着每个人的意义以及每个存在者的边缘域,却至今没能形成词语,更不用说形成概念了。这一大片繁花似锦的问题域,在以往的哲学中差不多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由此可见,布洛赫对“乌托邦”之概念内容的拓展,其目的就在于为这一无人问津的重要

领域命名或曰“形成概念”。

在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除了布洛赫没有将“乌托邦”概念简单化以外,阿多尔诺(1903—1969 年)和马尔库塞(1898—1979 年)等思想家也都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阿多尔诺认为,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甚至“摆脱了枷锁的、产品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必然就是实现了人的自由的“千年王国”,这是因为,事实总是比幻想和理论预期要复杂得多。在发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和“布拉格之春”运动遭到镇压之后,阿多尔诺对于乐观的启蒙主义以及隶属于此的传统乌托邦设计,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说,“根本就不存在不再会有邪恶的世界”^①。此外,阿多尔诺认为主客体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主客融合为一体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主客体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

而马尔库塞实际上非常赞赏超越既存社会的“乌托邦精神”。他曾在褒义上使用过“乌托邦(的)”概念,试图用“乌托邦(的)”来修饰那些被既存社会挡住去路的冲动、热望和幻想。他认为,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或许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号召人们从马克思回到傅立叶。在《论解放》一文中,马尔库塞认为“乌托邦的”的意思不应该是“无此地方”,而是:暂时被现存社会势力阻挡、却有可能实现。马尔库塞对“乌托邦”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解,已经和布洛赫的相当接近。但他基本上是在“社会乌托邦”这一层面上来理解“乌托邦”的,这与布洛赫的乌托邦阐释学又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说,马尔库塞是 20 世纪的西方马

^① [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14 页。

克思主义者中以特别不同于马克思的方式来谈未来理想社会的人；同时，他所构想的“社会乌托邦”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乌托邦”，在马尔库塞那里，没有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描绘，只有对理想社会可能性的论证。此外，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一样，是在批判中寄寓不满和憧憬，也即在批判中寄寓美好的乌托邦意向，可以说，乌托邦的栖息地往往就在批判理论之中，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僵化的乌托邦蓝图之设计与实践，使乌托邦意志保持在当下现实的生活中，也即保持在对现存社会的拒绝与批判中，成为知识分子个人思想的一种权利。

自莫尔以来，人们不仅把“乌托邦”概念与社会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这一概念与文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乌托邦”。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乌托邦”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在西方，许多学者把关于理想社会或未来生活的小说称之为“乌托邦的……”，于是便逐步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乌托邦小说”，这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模仿莫尔的《乌托邦》，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个理想社会，从莫尔那个时代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大量各种类型的乌托邦小说，从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小说，一直到只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科幻小说。英国的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就是一部典型的乌托邦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在梦中发现自己进入了未来的英国，在那里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部小说与“乌托邦”社会理论相区别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虚构，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知道自己在虚构，通过这种虚构，作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情操以及对现世的不

满和批判。诚如中国古代的《桃花源记》一样，渔人偶然在山谷里发现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乐土，第二次去却再也找不着了，这篇散文只好余音袅袅地结束在怅惘的情绪中。

至此，倘若我们将“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界定为一种人类对超越现存状况的价值理想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那么，无独有偶，“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的冲突和对立已然成为当今人类精神生活中困惑与迷惘的焦点，它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痛苦”，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所说：“形而上的欲望与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类精神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①可以说，对乌托邦精神的合法性进行否定与质疑，已成为现代人类生活特别是文学领域里的一股来势汹涌的思潮。

早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许多经典作家便已自觉地在其创作中对社会乌托邦思潮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于是，在 19 世纪后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所谓“反乌托邦小说”。其中，屠格涅夫的小说《烟》、《处女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等人的作品，都以其鲜明的反乌托邦性，对当时俄罗斯社会中狂热的社会乌托邦思潮对人的个性与自由的戕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考。

可以说，对乌托邦的狂想是对悲观主义和彻底虚无的反抗，它是人类心灵追求幸福、安宁、快乐和自身解放的亘古理念及理想境界，是人类乐观向上、精神自足的美好乐园。正如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被缚在悬崖上的主人公大声疾呼的那样：“我依然存在！乌托邦，乌托邦，我们乌托邦！”这种个人化了的乌托邦理

①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25 页。

想情结在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同样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后来的民粹派思想家们大都在他们的著述中表达了对乌托邦的理想观念。如果说 20 世纪以前的乌托邦理想大都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精神上的否定,他们以其乌托邦的幻想,寄托个人的理想追求,体现自己独立的思想个性,那么,这种本属于个人话语的乌托邦精神一旦被民族、国家、政权所用并作为一种现实的政策予以推行时,它就会丧失自己最初的“美好”精神而被扭曲和异化,进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精神乃至肉体的灾难(如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等)。然而,任何事物都逃不脱“正反同出、相生相克”之理,自“异化的乌托邦精神”诞生之日起,反乌托邦精神也随之俱生。在文学史上便出现了以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性、机械性以及社会存在阶级划分的专业性、等级化的不平等、不自由与权欲膨胀、物欲横流的异化状态感到恐惧与不安,对“乌托邦”理想精神的破灭感到失望并进行消极反抗为主要内容的“反乌托邦小说”。这一类小说通常表达了对所谓正面社会理想虚妄性的反拨。在这种社会中物质文明泛滥并高于精神文明,精神依赖于物质,精神受控于物质,人类的精神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这类小说的开创者是威尔斯。他于 1899 年发表的小说《当睡者醒来时》讲述的是,异星球上的主人公在冬眠了两百年后醒来,发现未来世界的大都市比过去的时代更为糟糕。作者在小说前言中写道:“这篇故事所描述的大都市正是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造成人类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加邪恶、堕落的制度原因替代了技术因素,“人祸”成了科幻小说的主题。后来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等巨著都纷纷

继承了这一传统,成为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伟大三部曲。

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不朽经典《我们》发表于1920年,是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小说因极具反乌托邦主义色彩而被剥夺了公开发表的权利,在当时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作者本人也因此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没有活着看到它在祖国正式发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在《我们》创作六十余年之后,该作品于1988年在苏联开禁发表。小说描写了一个千年后的世界,即在第二16世纪,人们在完全机械化的环境下,过着机器般统一的生活。在那个社会里,没有“我”,只有“我们”。反叛者将在公众集会上被气化掉。在那个社会里,人们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使政治警察(“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都穿着同样的服装,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为生,通常的娱乐活动便是四人一排齐步行进,与此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人与人之间没有婚姻,然而他们的性生活似乎也并非完全是滥交。为了度过这宝贵的“性爱时光”,每人都有—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簿,跟他(或她)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将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王国是由一位被称为“大恩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一旦谁愚蠢地要求自由,就会被驱逐到荒野中。而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自由,可令其重新享受到幸福。长期以来,《我们》被认为是一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的作品”,其矛头直指共产主义制度。然而我们

有理由相信,扎米亚京所要思考的并不只是集权主义的问题,还有后工业社会下人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

英国作家 A. 赫胥黎(1894—1962 年)创作的另一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被许多人誉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于 1932 年出版,虚构了“福特纪元”七百年后的世界。那时,人们像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并且生活在虚幻的文明中。书中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 632 年即公元 2532 年的人类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失去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阿尔法、贝他等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而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一九八四》(1949 年)则深刻分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极权主义社会,并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

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小说故事的背景是: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小说主人公温斯顿是生活在大洋国社会底层的政府小职员,由于他对所处的社会产生怀疑,对领袖“老大哥”产生怀疑,因而被判为思想犯,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成为一个思想纯洁者,在改造完成后即被处死。可以说,《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寓言。在其出版之后作者奥威尔便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奥威尔笔下的寓言式的社会不断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尤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暴力统治达到顶峰。

可以说,20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灾难究其本质都是对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剥夺。人类最宝贵的价值就是个性与自由,这显然是“反乌托邦”作家扎米亚京、赫胥黎以及奥威尔的共同心声。他们对20世纪集权主义社会形态的预见与批判,对人类生活中一切强权、反人性、反自由的批判恰恰体现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所提倡的

“文学是人学”的精神准则。审视苏联文学七十年历史,从“苏维埃文学”的诞生到其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思潮紧密相关,而苏联社会思潮的变化又与国家的政权意志是分不开的。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伴随着苏维埃政权这个20世纪人类历史上新政体的诞生,苏维埃文学也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然而,由于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强烈的乌托邦精神,而这种乌托邦精神不同于以往的乌托邦理想,它将本属于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乌托邦精神据为己有并上升为一个政治集团与国家的治国理念,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统治政策加以实施,使乌托邦精神丧失了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这一原本特质而沦为国家政权意志的代言人。而苏联特殊的社会形态使苏联文学对苏联政权的依附与对抗便决定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种精神始终交织并存于苏联文学之中,彼此对立,不断消长。

30年代,在苏联文学发展的最初岁月里,由于苏联人民对新社会、新生活充满了热望,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理想的极大热情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实行了严格的“大一统”式管理。而这一时期在苏联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便是依附于官方意志、体现为一种高昂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的乌托邦精神。具有这种乌托邦精神的作家们真诚地相信周围发生的巨变,他们相信,美好的生活已经到来,期待已久的理想正在实现。他们胸怀革命理想主义信念,为这个新生国家、崭新时代大唱赞歌。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如卡达耶夫的小说《时间呀,前进!》、莎吉娘的小说《中央水电站》、革拉特柯夫的小说《动力》等)以及颂扬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作品(如潘菲洛夫的小说

《磨刀石集体农庄》等)。这些作品大都因突出对当时国家政策的图解而忽视了对个人本真的精神世界的描写,作品中作家对“物”的追求远胜于对“心灵”的探寻,因此虽充满真诚的乌托邦理想,却缺乏真正的艺术个性。此外,阿·托尔斯泰的鸿篇巨著《苦难的历程》表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接受洗礼后走向光明的主题,马卡连柯的小说《教育诗篇》以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现了苏维埃人的成长历程主题。这几部重要的代表性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熏染。

到了40年代末,随着苏联历史的进程,体现为革命理想主义激情的乌托邦精神渐渐发生了蜕变,成为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原本真诚的满含着乌托邦精神的文学终于演变为充满谎言的“粉饰生活”之作,比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苏洛夫的剧作《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巴甫连柯的长篇小说《幸福》、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如果说早期的乌托邦精神还能以一种所谓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给人带来震撼,那么,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发生蜕变的乌托邦精神则只能给人以“瞒与骗”之感。作家们丧失了苏联文学中的苦难意识和直面现实的勇气,以高度政治化的话语、表面甜腻的抒情,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性。

尽管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依附于国家意志的乌托邦精神(由理想主义蜕变为伪理想主义)在苏联文学中占据了绝对的治疗地位,但反乌托邦精神始终以自己或明或暗的方式与之进行着对抗,顽强坚守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精神。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安魂曲》通过对苏联不幸岁月的追忆表现了苏联人民心灵中的

苦难意识；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以怪诞的艺术形式，对苏联现实进行了绝妙的讽刺和彻底的解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基坑》、《初生海》等以高度寓言化手法预言了国家乌托邦狂想的悲剧。如果说阿赫玛托娃和布尔加科夫等人对苏联文学中乌托邦精神的对抗是“明”的，其作品遭遇的是被尘封抽屈的命运，那么亚历山大·格林、普里什文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对抗方式则是“暗”的，他们以潜在的方式否定现实，对经受精神磨难的人们给予心灵的慰藉。格林的中篇小说《红帆》、《踏浪女》充满了浪漫的异国情调和对人性善的呼唤；普里什文对大自然哲理性的体悟让人体味到什么是生命的真正价值；而巴乌斯托夫斯基以涓涓细流般优美的散文使人领悟到平凡生活中的美。

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这大约十年的“解冻”时代里，乌托邦精神终因自身的蜕变使反乌托邦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勃兴。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对厂长茹拉甫辽夫只要产量不顾工人生命的官僚作风的指责体现了对乌托邦精神所宣扬的国家建设中蔑视人，贬低人的反人道主义做法的批判。这部小说虽然艺术上略显粗糙，但由于它在伪理想主义泛滥的文学氛围中较早地透露出了反乌托邦的思想倾向而不失为一部可贵之作。随后，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以更明显的反乌托邦精神颠覆了人们对乌托邦主义神话的幻想。而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则因在苏联文学中首次表现了“劳改营”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冲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神话而在劳改营题材文学发展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帕斯捷尔纳克的史诗巨著《日瓦戈医生》在哀婉的爱情故事之中透露着苏联历史的沧桑与巨变，其更深刻的反乌托邦意识是不言自明的。而格